**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的善书劝善**

符晓林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王国平、唐力行教授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以下简称《碑刻集》）于1998年出版。该《碑刻集》是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史碑刻集，内容丰富，反映明清苏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第403、404、405、406、407、408号等六块碑上的碑文是当年的善书，善书发挥道德劝化功能，好事者将善书镌刻成碑文，努力引导社会道德风向。本文借此一窥明清苏州社会的道德引导方式及其取向。

关键词：明清时期；苏州社会；善书；道德

道德引导是社会生活重要的环节，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对此好事者将善书镌刻成碑文，努力引导社会道德风向。

403号碑《靠天吃饭图说》引用古语，劝诫人们将命运交付给天：“古语云：信步行将去，凭天付下来。古今大家小户，谁不靠天吃饭？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只要安分守己，顺理行去，何必朝思夕想，枉费心机？又语云：千算万算，难逃天止一算。”又，录往昔的《警世歌》，其中“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儿孙自有儿孙福，忧甚么”、“他家富贵生前定，妒甚么”、“前世不修今世苦，怨甚么”等句子，都是劝诫世人一切天注定。明清时期的苏州社会商品经济发达，源于大量徽州移民，无徽不成镇，并出现行商、坐商与海商等多种形式的商人，且资本主义早先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传统四民社会，商人在等级社会不看好的情况下，打拼自己的天下。按照一般逻辑思维，应该鼓励冒进与闯荡，但是，该碑文善书中却不断打击民众拼搏的积极性，固守现有的条件莫去争夺，不尽让人思考。余以为，碑文强调的不是一昧的保守，而是鼓励一种对欲望的克制。

404号碑《行乐歌》是明代人孙玉柱赞美家族先祖归隐山林一事，“时当宋季，身履金寇之变，志不仕元，弃上虞故里，遁居琴川，是闻伯夷之风而兴者，真与晋陶靖节一辙也”。不仅如此，他并将自己仕途亨通归因于始祖的“亢志隐德”，“玉柱忝登嘉靖壬辰榜进士，仕至中宪大夫按察使副使，此吾始祖亢志隐德之源深，曾祖卫国保民之积厚也”。至此有两点值得细细咀嚼。第一，孙玉柱身处明朝嘉靖年间，他将“隐德”视为一种“美德”，这符合明代前期的墓志铭中常常出现“隐德弗耀”的现象，这表明在出世与入世中，明代前期的苏州人更倾向于作一个低调的隐士。第二，孙玉柱赞美出世，却选择入世，可见明朝中期处于社会转型期，“仕”与“隐”都是值得称道的取向，并且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讲求实际的入世行为逐渐要占据上风。

405号碑《忍字歌》提出吴地江北与江南两处民风皆是喜欢与人争执，并惹来不小的麻烦。江北人好争名利，与人常争执于田屋与钱财，一言不合便酿成人命之灾，凶首重则遭砍头或绞刑，轻则承受监牢之苦，连累父母与妻孥，株连证佐与邻保。更有一种亡命徒，不惜弃命去害人。江南人则非争名利只争气， 一纸诉状到衙门，讼师、衙役认钱不认理，穷者成输家，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是所谓的“江北好勇多轻生”，“江南好讼多速狱”。究其原因，认为是不忍，“好勇皆由不忍来，细嫌小隙构祸胎”，“乃若好讼犹可异，事起睚眦极微细”。鉴于此，碑文劝诫人们在天伦之间遵循“忍”的处事原则，方能避免灾祸，与人和睦相处。早在西汉，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已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明清苏州社会矛盾的产生与解决也紧紧围绕着“利”，古往今来，人们面对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都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苏州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苏州人面对这古今难题，提出“忍”的解决方案，可见，深受儒家以和为贵道德标准的影响。

406号碑《关圣帝君宝训》以民间所信奉的关圣帝君的口吻引导民众向善。碑文先提出人对待天地神灵与五服的行为准则，做到对最亲近的人好之后，还要将善意散播到更远的地方，如：“救难济急，恤孤怜贫。创修庙宇，印造经文。舍药施茶，戒杀放生。造桥修路，矜寡援困。重粟惜福，排难解纷”。一切善事皆由善心出发，心若存恶心，便行恶事，诸如：“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坏人名节，妒人技能。谋人财产，唆人争讼”。为避免人行恶事，以宗教轮回的因果报应说，规范人们的生活，提倡向善积德。“近报在身，远报子孙。神明鉴察，毫发无紊。善恶两途，祸福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

408号碑《关圣帝君四愿》同样借助关圣帝君，碑文开宗明义，提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存好心，愿人常行好事，愿人常说好话”。进而，提出获得幸福的方法论，即学会珍惜，珍惜生命是长寿的秘籍；珍惜粮食是富足的根本；谨言慎行是福贵的基础。同样，与406号碑一样以“福报”的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言行必留好样与子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406号碑所指出的损人利己等恶事，并非想象，而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408号碑之所以强调的“惜”也是基于社会挥霍之风，明清时期苏州社会繁荣与乱象并存，社会道德秩序急需修复，鉴于此，“请”来了关圣帝君与借助“轮回”之说的力量。实际上，关圣帝君乃儒、释、道三教共有的神灵，轮回则是佛教语，到了明清时期，宗教之间的间隙不大，逐渐融合一体，这种模糊又统一的民间信仰，对民众无助的内心极尽安抚之责，对民间杂乱的生活秩序发挥了规范作用，是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407号碑《书示义庄领米诸人》卢樵镛代表宗族对开设的义田所扶助的对象进行说明，希望宗族义田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族人要循规蹈矩，按照自身条件领米，不可有所欺瞒。“赡族设义田，望各为良民”。并由此，拓展到对近来出现的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并警示族人做一个守法守规律的人。古代社会人口流动不大，宗族对个人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国家，明清时期如此，时至今日，宗族社会在农村仍有余威，回看近代中国发生多起教案，就是由于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族的碰撞摩擦，而上升成为国家外交事件，宗族为民众所依附，其规则也为民众所遵守。

对于明清苏州社会而言，商品经济引起尖锐的社会矛盾，有心人将善书镌刻于碑上，试图教化民众、引导民众，改善社会风气。从《碑刻集》中的善书尤可见，明清苏州人为化解矛盾，借助古语、先祖、儒家精神、关圣帝君与宗族力量等多种方式，劝诫人们克制欲望、发扬隐德、学会隐忍、行善结德、学会珍惜、遵守规矩。依靠碑文的广为流传，苏州人们面对诱惑与不堪，都会做出适当的选择，铸就良好的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社会史碑刻集[M],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Key words: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uzhou society; Good book; Moralty

Professor Wang and Tang write <The social history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suzhou stone inscription>.The stone inscription set is published the first domestic social history inscriptions set, rich in content, refle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in suzhou. Among them, 404, 404, 405, 405, 407, 408 and so on six inscription on the stone, is a good book of the year, A good book exert moral reasoning function.Somebody will engrave into the inscriptions, a good book to guide social moral direction. This article take a snapsho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orientation of the social moral guide in suzhou.

﹝作者简介﹞ 符晓林（1991—），女，汉族，海南海口，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两篇。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邮编：330022。